

忆大山

习近平

贾大山离开我们已经一年了。他去世以后，在他的家乡正定，在他曾默默耕耘了二十多个春秋的当代文坛，引起了不小的震动。昔日的同事、朋友和所有认识他、了解他的善良的人们，无不在深切地怀念他，许多文学界的老朋友和他家乡的至交，怀着沉痛的心情，写下了一篇篇情真意切、感人至深的纪念文章。一个虽然著名但并不算高产的作家，在身后能引起不同阶层人士如此强烈的反响，在文坛、在社会上能够得到如此丰厚的纪念文字，可见贾大山的人格和小说艺术是具有何等的魅力。

1982年早春，我要求离开中直机关到基层锻炼，被组织分配到正定任县委副书记。那时，贾大山还在县文化馆工作，虽然只是一个业余作者，但其《取经》已摘取了新时期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的桂冠，正是一颗在中国文坛冉冉升起的新星。原来我曾读过几篇大山的小说，常常被他那诙谐幽默的语言、富有哲理的辨析、真实优美的描述和精巧独特的构思所折服。到正定工作后，更是经常听到人们关于贾大山的脾气、性格、学识、为人的议论，不由地让人生发出一种钦敬之情。特别是我们由初次相识到相熟相知以后，他那超常的记忆、广博的知识、幽默的谈吐、机敏的反应，还有那光明磊落、襟怀坦荡、真挚热情、善良正直的品格，都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我到正定后，第一个登门拜访的对象就是贾大山。一个春寒料峭的傍晚，我在工作人员陪同下来到大山居住的小屋，相互问候之后，便开始了漫无边际的闲聊，文学艺术、戏曲电影、古今中外、社会人生，无所不及，无话不谈。虽然第一次见面，但我们却像多年不见的朋友，有说不完的话题，表不尽的情谊。临别时，他还拉着我的手久久不愿放开：“近平，虽说我们是初次见面，但神交已久啊！以后有工夫，多来我这儿坐坐。”他边说边往外送，我劝他留步，他像没听见似的。就这样边走边说，竟一直把我送到机关门口。

此后的几年里，我们的交往更加频繁了，有时他邀我到家里，有时我邀他到机关，促膝交谈，常常到午夜时分。记得有好几次，我们收住话锋时，已经是次日凌晨两三点钟了。每遇这种情况，不是他送我，就是我送他。为

了不影响机关门卫的休息，我常常叠罗汉似的，一人先蹲下，另一人站上肩头，悄悄地从大铁门上翻过。

1982年冬，在众人举荐和县领导反复动员劝说下，大山不太愿意地挑起了文化局长的重担。虽说他的淡泊名利是出了名的，可当起领导来却不含糊。上任伊始，他就下基层、访群众、查问题、定制度，几个月下来，便把原来比较混乱的文化系统整治得井井有条。在任期间，大山为正定文化事业的发展和古文物的研究、保护、维修、发掘、抢救，竭尽了自己的全力。常山影剧院、新华书店、电影院等文化设施的兴建和修复，隆兴寺大悲阁、天宁寺凌霄塔、开元寺钟楼、临济寺澄灵塔、广惠寺华塔、县文庙大成殿的修复，无不浸透着 he 辛劳奔走的汗水。

作为一名作家，大山有着洞察社会人生的深邃目光和独特视角。他率真善良、恩怨分明、才华横溢、析理透澈。对人们反映强烈的一些社会问题，他往往有自己精辟独到、合情合理的意见和建议。因此，在与大山作为知己相处的同时，我还更多地把他这里作为及时了解社情民意的窗口和渠道，把他作为我行政与为人的参谋和榜样。

大山是一位非党民主人士，但他从来也没有把自己的命运与党和国家、人民的命运割裂开。在我们党的政策出现某些失误和偏差，国家和人民遇到困难和灾害的时候；在党内腐败现象滋生蔓延、发生局部动乱的时候，他的忧国忧民情绪就表现的更为强烈和独特。他利用与基层民众水乳交融的关系，充分调动各种历史和文化知识，以诙谐幽默的语调，合情人理的分析，乐观豁达的情绪，去劝说人们、影响人们，主动地做一些疏导和化解矛盾的工作。同时，他更没忘记一名作家的良知和责任，用小说这种文学形式，尽情地歌颂真、善、美，无情地揭露和鞭挞假、恶、丑，让人们在潜移默化中去感悟人生，增强明辨是非、善恶、美丑的能力，更让人们看到光明和希望，对生活充满信心，对党和国家的前途充满信心。

我在正定期间，不论是在工作上还是在生活上，得到大山很多的支持和帮助，我们之间也建立了深厚的情谊。记得1985年5月我即将调离正定去南方工作的那个晚上，我们相约相聚，进行了最后一次长谈，临分手时，俩人都

流下了激动的泪水，依依别情，难以言状。

我到南方以后，曾经给大山去过几封信，只是大山甘于恬淡寂寞，不喜热闹，未有及时回应。以后我也因工作较忙，很少给他写信了，只是偶尔通个电话，送上衷心的问候和祝愿。我还曾多次让人捎信儿，希望他在方便的时候，到我工作的地方去走一走，看一看，可他总是说我担子重、工作忙，不愿给我添麻烦。虽然接触联系少了，但我们之间的友情并未随日月流逝而淡漠，他常向与我联系较多的同志探询，密切关注着我的工作情况和动向，我也经常向到南方出差的正定的同志询问他的身体、工作和创作状况。每次见到正定的同志，我都请他们给他带去一些薄礼。每年春节前夕，我总要给他寄上一张贺卡，表达自己的思念之情和美好的祝愿。

1991年春节，在离开正定6年之后，我受正定县委之邀，又一次回到了我曾经工作和生活了三年多的第二故乡——正定。我抽时间专程到家里看望大山。那时 he 已主动辞去了文化局长职务，到县政协任专职副主席了。他依然那样豁达乐观、诙谐幽默，依然那样身板硬朗、精神矍铄，并依然在担任领导职务的同时坚持着他的小说创作。那年，他还不到50岁，正当精力充沛、创作欲望非常强烈的黄金时期。他告诉我，什么小说在哪个杂志发表了，什么小说被哪几家刊物转载了，正在构思或写着什么，显得非常兴奋。那次相见，由于时间关系，我们没能长谈，便依依惜别了。

1995年深秋，我从一个朋友口中得知大山患病并已做了手术，尽管说手术相当成功，还是给关心他的人们心头蒙上了一层厚重的阴影。我不时打听着他是否康复的消息，但每次得到的都是同样的回答：他的病情不见好转，却一天比一天更瘦了。后来，听说 he 到省四院做了食道扩张治疗，能吃进一些流食了。再后来，听说又不行了，正在北京协和医院做诊断检查。刚好，我那几天正在北京开会，便抽空到医院去看望 he。见到 he 时，眼中的大山早已不是昔日大山的模样，只见 he 面色憔悴，形体枯槁，蜷缩在病床上不停地咳嗽，只有那两只深深凹陷进去的眼球，还依然闪耀着流动的亮光。他看到我进来，立即挣扎着从

床上坐起，紧紧握住我的双手，激动的泪水早已夺眶而出。稍微平静些后，他就给我述说病情的经过。我坐在他的床头，不时说上几句安慰的话，尽管这种语言已显得是那样的苍白和无力。那次见面，我们两人都显得非常激动，因为我知道，恶魔般的细胞，此时已在大山的肝脏、胰脏和腹腔大面积扩散。我不忍心让 he 在病疼之中再过于激动，为了 he 能得以适度的平静和休息，我只好起身与 he 挥泪告别。临走，我告诉他，抽时间我一定再到正定去看 he。

1997年2月9日，是农历的正月初三，我又一次回到正定，再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去看望大山。这时的大山，身体的能量几近耗尽，他的面色更加憔悴，形体愈显瘦小，声音嘶哑，眼光浑浊，话语已经不很连贯，说几句话就要歇一歇。此时我心中已有一种预感——恐怕大山的驾鹤西去为期不远了。至此，一股悲怆的情绪油然而生，我不由自主地紧紧握住大山的手，泪水溢满了眼眶。这时的大山，却显得非常平静，倒是先安慰起我来。我提出再和他照张合影，他笑着说：“我已瘦成这样，不像个人样儿了，叫人看见怪吓人的呀！” he 虽是这样说，可还是挣扎着坐了起来。这张照片，成了我和大山，也是大山和别人最后的一张合影。

2月21日，在我刚刚离开正定才十来天，突然接到电话告知——著名作家贾大山于1997年2月20日晚因病去世，享年54岁。

噩耗传来，我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之中。大山的逝世，使我失去了一个好朋友、好兄长。我多么想亲自去为他送行，再看 he 最后一眼哪！无奈远隔千里，不能前往，也只能托人代送花圈，以示沉痛悼念了。

大山走了， he 走得是那样匆忙，走得是那样悄无声息，但他那忧国忧民的情襟，清正廉洁、勤政敬业的作风，襟怀坦荡、真挚善良的品格，刚正不阿、疾恶如仇的精神，都将与 he 不朽的作品一样，长留人间。

（此文发表于《当代人》杂志1998年第7期，本报转载自《光明日报》2014年1月13日二版）

“文学与时代”随笔

□李 冰

（一）

国学大师王国维曾说：“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这句类似格言的话，符合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之哲学原理。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形象反映，无论是观照现实还是重现历史，文学都天然与时代发生着或显明或隐蔽的联系；无论是纪实还是虚构，文学都真切地表达着对时代或直接或婉曲的认识。从远古神话到志怪、传奇、笔记再到小说，从先秦诸子著述到唐宋八大家文章、明清小品再到白话散文，从《诗经》到唐诗宋词再到现代新诗以及口语诗歌，莫不是时代的产物。正如法国艺术批评家丹纳所说，艺术作品的产生取决于时代精神和周围的风俗。每个时代都有代表那个时代的标志性作品，它们从形式到内容无不打上时代的烙印。

（二）

文学作品虽非历史学社会学著作，却能映射出各个时代的世情人心，饱含各个时代的丰富信息，因此有把作家喻为“社会历史的记录者”、把文学作品喻为“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的说法。人们常举巴尔扎克和他的《人间喜剧》为例。《人间喜剧》堪称一部法国19世纪上半叶的社会生活史，巴尔扎克通过自己的作品反映了那个时代“任何一种生活状态，任何一种容貌，任何一种男人或女人的性格，任何一种生活方式，任何一种职业，任何一个社会区域，任何一个法国城镇”。事实上，巴尔扎克完成了拟定的137部作品中的96部，精心塑造了2472个人物，巨细无遗地描绘出了当时法国社会的完整风俗画。马克思称赞巴尔扎克“用诗情画意的镜子反映了整整一个时代”。恩格斯也评价《人间喜剧》“汇集了法国社会的全部历史，我从这里，甚至在经济细节方面……所学到的东西，也要比当时所有职业的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全部东西还要多”。

（三）

伟大的时代呼唤伟大的文学作品。当代作家应该感应时代、书写时代，谱写出反映时代的华丽篇章。然而，令人忧虑的是，虽然这些年社会各方面一直呼吁创作贴近生活、反映时代，但一些作家尚未表现出拥抱时代的充分热情，甚至存在着某种“逃避时代”的倾向，体现在作品中便是缺少时代气息与现实温度。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很多，其

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一些作家内心深处存在观念误区。

有人认为，文学应该与时代保持距离，直接反映当下社会生活，有“应景写作”之嫌，会伤害作品的文学性。其实，作品的文学性如何取决于作家的文学修养和写作能力，并不取决于题材。认为书写时代的作品会影响文学品位，是一种误解。文学史证明，许多名家正是对本时代社会生活进行高度的典型概括，深刻挖掘出蕴藏在本时代题材中的人文精神，才创作出流芳百世的作品。杜甫的“三吏”“三别”就是如此。

有人认为，“文学反映时代”是一种过时的理念，现代文学更注重对人的个体生存和“内世界”的呈现，追求的是文学的超越性、永恒性而不是时代性。“超越时代”不是悬浮在半空中超越，完全脱离现实感的作品无论在现世还是后世都是不会真正受到欢迎的。优秀文学作品具有超越时代的永恒意义，与反映时代并不矛盾。某种意义上，越是时代的，才越是永恒的。鲁迅的小说和杂文深刻地反映了半殖民地半封建时代中国的真实现状，它们至今仍具有超越性的影响。

（四）

任何时代都是立体的而不是平面的，是多彩的而不是单色的，是复杂的而不是简单的。在社会生活中光明与黑暗、先进与落后并存。书写时代必须正确处理歌颂与暴露的关系。要全面地、辩证地审视现实，透过现象认清本质，把握住社会生活的基本面和基本走向。

我们所处的时代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目标。当今时代为文学创作提供了极其丰富的素材和强盛的精神力量。盛世文章可期，人民改革创新历程、普通劳动者可歌可泣的奋斗足迹，老百姓追求美好生活的实践，都值得挥毫大书。同时，我们也不讳讳现实生活中存在的问题，确实有些肮脏现象令人深恶痛绝。弘扬真善美，鞭挞假恶丑，是文学创作的两个方面，不能注重一个方面而忽略另一个方面。应该站在思想和艺术的高度，充分体现时代精神，反映时代本质，呈现时代的丰富性。在把握现实中，分清历史发展的主流、支流，或对时代作简单化的理解，可能造成对时代面相的遮蔽与误读，削弱作品的认识价值和现实意义。

最近，我读到一篇文章，文中说，某些文艺作品中的“戾气”，往往源于对某种社会情绪的“迎合”以及对社会发展走向认知和理解的片面化，“戾气”不是创作的正

道，无法给文艺带来真实的生机。此论我深以为然。对于社会上存在的各种矛盾、不如人意之处，要进行客观分析，取积极态度。“明朝散发弄扁舟”是消极的，“我以我血荐轩辕”才是积极的。对于丑恶与黑暗，我们不仅应抨击丑恶，更应努力用正义去战胜丑恶；不仅应揭露黑暗，更应努力用光明去驱逐黑暗。

（五）

文学的现实主义注重表现生活的真实，刻画典型环境和典型人物，它与时代的写照形成密切的对应关系。现实主义在表现时代生活方面，具有重要的优势，但它不是唯一的创作方法。表现时代的优秀作品，可以产生现实主义，也可以产生浪漫主义、现代主义等其他创作方法。杜甫的现实主义作品和李白的浪漫主义作品都是对诗人生活的那个时代的忠实记录，只不过风格和手法不同。普鲁斯特的《追忆逝水年华》和乔伊斯的《尤利西斯》是现代主义杰作，作者对现实的幻想或感应曲折传达了对时代本质的深切认知。郭沫若的《凤凰涅槃》、惠特曼的《草叶集》都是充满激情和想象的浪漫主义作品，同时也是具有强烈时代感的作品。因此，在书写时代上，再现与写实的方法固然重要，抒情的、幻想的、变形的、象征的、魔幻的等等艺术手段也同样可以占有一席之地。

（六）

反映时代可以用“宏大叙事”，也可以用日常叙事。反映一个风起云涌的大时代，采用宏大叙事当然是不错的选择。《三国演义》就是宏大叙事，作品全景式描写了东汉末到西晋初近百年军事、政治、经济、文化活动，写了栩栩如生的1798个人物。被誉为“世界上最伟大的小说”的《战争与和平》也是宏大叙事，作品以史诗般广阔与雄浑的气势，生动描摹了1805年至1820年俄国社会的重大历史事件和各个生活领域。宏大叙事是一种重要的写作样式，但并非书写时代的不二法门。不能片面追求叙述大的历史事件、大的时间跨度、大的社会场面而拘囿了自己的视野。在表现时代生活时，每位作家都有属于自己的素材、体验、视角和形式。对日常生活的开掘，只要有深度，同样可以造就具有时代特征的大作品。《红楼梦》对没落的中国封建社会有着力透纸背的深刻描绘，小说呈现

的主要是家庭生活的琐细场景，普通人物的日常关系，但小说所达到的情感与思想境界，烘托出的时代氛围却是一般“宏大叙事”所难以企及的。老舍先生的《茶馆》也不属于宏大叙事，但通过一个小茶馆的起落兴衰和来往人物的描绘，浓缩了清末维新、军阀割据、民国三个历史时期中国社会的变迁。谁能说小茶馆里没有时代风云呢。

（七）

文学是照亮时代前进的灯火。在文学史上有影响力的作品，往往能在唤起民众、推动社会进步方面起到不可忽视的作用。茅盾先生曾经说：“我们决然反对那些全然脱离人生的而且滥调的中国式唯美的文学作品。我们相信文学不仅是供给烦闷的人们去解闷，逃避现实的人们去陶醉；文学是有激励人心的积极性的。尤其在我们这个时代，我们希望文学能够承担唤醒民众而给他们力量的重大责任。”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成长起来的一批作家，以天下为己任，把改造中国当成自己义不容辞的使命，面对羸弱的中国，通过作品高声呐喊，催生社会的变革。郭沫若的《女神》诅咒黑暗、追求光明，充分反映了当时“狂飙突进”、冲决一切污泥浊水的时代精神，成为反帝反封建的嘹亮号角。歌剧《白毛女》以富于鲜明时代感的主题，号召人们投身革命，奋力砸碎“将人变成鬼”的旧制度，建设人民当家做主的新社会。改革开放以来，活力焕发的中国作家们也伴随着历史的脉搏，以井喷般的创作激情，反映时代，为促进时代发展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八）

党的十八大围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出了“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明确提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中国梦，凝结着无数仁人志士的不懈努力，承载着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向往，昭示着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美好前景。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为实现中国梦贡献力量。近年来，广大作家书写中国梦，推出了一些佳作，但无论是在质量还是数量上，都还不能满足人们的要求。故此，写下这篇零散絮叨的随笔，意在期盼更多的为伟大时代放歌、为中国梦立传的好作品问世。

（此文转载自《光明日报》2014年1月13日十三版）